



安博
著

生态审美经验问题研究

从现象学视野出发

山东大学出版社

生态审美经验问题研究

——从现象学的视野出发

安 博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审美经验问题研究:从现象学的视野出发/安博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607-6198-5

I. ①生… II. ①安… III. ①生态学-美学-研究

IV. ①Q1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9731 号

责任策划:李孝德

责任编辑:李孝德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3008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3 印张 204 千字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本书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系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博士重点项目“生态审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 2016CBZ013) 的结项成果。

序 言

本书首先对生态美学的学科发展进行了简要梳理与回顾,并指出了审美经验问题研究在当下生态美学研究中的意义。接着,针对生态美学中对生态美感经验研究的不足,立足于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和生态现象学的方法,从身体感知、审美直观和生命体验三个维度论述了生态审美经验的生发过程。本书有以下三个特色:其一,提出生态审美经验在生态美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与重要作用;其二,以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为理论基础,引入现象学的方法研究生态审美经验的发生过程;其三,结合具体的生态审美体验案例,将实际生态审美体验融入到对生态审美经验的描述阐释之中,体现了生态美学审美的实践性特征。

从基本立场来说,我们认为对生态审美经验的研究应牢牢建立在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的基础之上。生态存在论是以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为理论指导,研究生态系统之审美的新型态的美学理论,其带给我们研究生态审美经验的启示便是生态美感是发生“在此在世界中存在”、人与自然在人的实际生存中结缘的关系性存在之下的。这意味着对生态审美经验问题的研究不能走传统认识论的老路,因为生态之美不是一种实体化的、可以被静观的“本质”,而是一种在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动态结构中生发的具有生成性、参与性的动态

美感经验。

从研究方法来看,我们认为必须从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的方法入手,来描述与阐释生态审美经验的具体发生过程。这是因为现象学从现象出发,通过对现成观念和意义的“悬隔”,以描述与阐释的方法获得对事物本质的直观的方法与生态审美中从对具体自然物的感知到对生态系统的审美化把握的过程是一致的。现象学方法对于研究生态审美经验的启示在于:只有在“悬隔”掉人对生态自然的认识关系之后,重新回到自然与人的原初存在关系之上,我们才能在这种存在论基础上重新建构出自然对于我们的意义,发现人在自然界中的审美化生存模式。“我们只有凭借这种‘生态现象学方法’才能超越物欲进入与自然平等对话、共生共存的审美境界。”^①

从具体的生态审美经验发生过程来看,生态审美由身体感知、审美直观与生命体验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构成。首先,生态美感经验的产生起始于身体对具体自然环境的感知。这里的身体不再是传统哲学中动物性的存在,而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主体”,其是感官联觉、肉身与精神的统一并具有意向性的功能。与此对应,这里的自然环境也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被感知要素,而是现象场中所有可被感知物联合在一起的视域背景。其次,在生态审美经验中,“身体-物体-背景”的感知方式意味着自然景物总是存在一种被感知的内在性与超出感知之外的超越性的张力,而人们必须发挥审美直观的作用才能把对具体的自然事物的感知上升到对超越并统摄它们的生态系统的把握。通过对胡塞尔的直观方法的借鉴,我们在生态审美体验中可以由木见林,通过联想、类比、回忆和期待等手段将当下身体感知的背景视域不断延伸,继而在当下视域与其他时空视域的关联下发现作为普全视域的生态世界的存在。最后,对生态世界的发现不是认识过程,而是海德格尔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命体验过程。从生态审美的角度来看,“此在的在世之在”建立了人与自然须臾难离的生存模式,在这种共在的关系中,人既同其他生物平等共存,但又是其他存在者的照料者。正是在这种与自然事物的结缘关系中,人才能领会生态世界中万物的和谐统一和生物的多样存在之美,并在这种情感化的体验中领悟人自身的存在意义。

^① 曾繁仁:《生态现象学方法与生态存在论审美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目 录

第一章 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	(1)
第一节 生态美学诞生的背景	(2)
第二节 生态美学的理论来源	(14)
第三节 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发展	(25)
第二章 生态美学中生态审美经验问题	(33)
第一节 生态美学发展的理论危机与再造路径	(33)
第二节 生态审美经验概述	(48)
第三章 身体感知在生态审美经验中的首要地位	(67)
第一节 美学的“身体转向”与生态美学中的身体问题	(73)
第二节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与身体感知	(82)
第三节 生态审美经验中的身体感知	(88)
第四节 身体感知的案例分析	(103)

第四章 审美直观在生态审美经验中的过渡作用	(107)
第一节 生态美学中内在性与超越性的悖论	(108)
第二节 现象学中的本质直观	(116)
第三节 生态审美经验中的审美直观	(125)
第四节 审美直观的案例分析	(142)
第五章 生命体验在生态审美经验中的最终显现	(146)
第一节 海德格尔与生态美学的确立	(148)
第二节 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中的“生命”问题	(160)
第三节 生态审美经验中的生命体验	(170)
第四节 生命体验的案例分析	(184)
结 语	(189)
参考文献	(192)

第一章

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

从 21 世纪伊始至今,生态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已成为我国美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其愈来愈受到诸多学者与广大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而生态美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显学,这不仅仅是因为生态美学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意义与丰富的审美内涵,更是因为生态美学作为一种新形态的美学理论体系乃是由中国学术界首创并已丰富完善。正如汝信先生所言:“生态美学的提出是我国学术界的首创,正好弥补了生态研究的一个空白,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①

首先,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人们的现实生存状态呼吁良性的生态环境。当下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雾霾、沙尘暴、泥石流、水污染、重金属污染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人们对恶劣的生态环境日益产生反感之情的同时也渴望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活并获得一种美的、愉悦的体验。所有美学研究者几乎不能否认的是,生态审美是人的存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对自然生态的亲和与热爱是人的本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美学与人的“存在”息

^① 曾繁仁:《转型期的中国美学》,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7 页。

息相关。这就意味着生态美学不仅进行着专业理论化学术生产,而且还指导着人“诗意的栖居”。因此,生态美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以审美的方式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其次,从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对生态美学的研究也有利于助推我国美学学科向前发展。我国美学学科的发展长期拘囿于认识论模式之下,使得其理论构架与文艺发展乃至生活需要相去渐远。而现代西方美学发展思潮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美学研究已经从重视“美的本质”问题转向了关于具体的审美现象问题的研究。当下我国美学学科的发展在越过“实践美学”的高峰之后正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审美的泛化或者审美的生活化与当代人的生存方式遥相呼应。因此,传统的审美形态表述已经不适用于这些新兴的美学学科领域(如生态美学、科技美学、生活美学、审美文化学等),研究这些新兴的学科领域要用新的理论方法去研究该领域所特有的审美现象。生态美学中关于生态系统的审美问题研究就是其中一例。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新兴学科领域的自身发展,而且还推动了美学学科本身的繁荣昌盛。

生态美学正是在实践与理论上的双重意义才使得其学科的发展蓬勃向前。本章节基于实践与理论双重维度,拟对我国生态美学的学科发展做出勾勒。首先,我们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历史、中国美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与我国社会主义背景下的环保政策等因素出发,描绘生态美学诞生的时代背景。其次,从生态美学的交叉学科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西方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古典美学思想资源着手,发掘生态美学的建构所依赖的理论资源。最后,本章还对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

第一节 生态美学诞生的背景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生态美学不是学科内部闭门造车的产物,它不仅从诸如生态学、环境学、生态哲学、环境美学等相关学科的蓬勃发展中汲取了理论资源,而且还与人类现实的社会历史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主题息息相关。因此,对生态美学的诞生背景分析,就要从历史、学科以及时代背景三个方面着手:

1. 生态美学诞生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生态美学作为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它的诞生不是凭借某个头脑的天才思维，而是与工业文明时代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只有从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着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生态美学所独有的实践品质。

进入 20 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由 19 世纪的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原材料掠夺模式转变成了由跨国公司为主导、以消费带动生产的全球化流水线作业模式。这种“福特式”的新生产方式通过更加细致的社会分工，极大地提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在为发达国家的民众带来丰富的物质产品的同时，也加剧了对富含自然资源地区的过度开采以及对工业发达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诚如法国前教育部长克莱德·阿莱格尔所说的那样，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类的力量已经成为超越自然存在而对地表形态塑造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如核武器），人类已经“成为一个超强地质因素，其行为严重扰乱了已经坚持了 40 亿年的地质史的著名的‘动态平衡’”^②。而 20 世纪一次次环保危机的爆发，在用血淋淋的事实为人类社会的这种生产—消费模式敲响了警钟：比利时 1930 年发生的马斯河谷事件是 20 世纪最早的环境公害事件，当地工厂排放的有害气体和煤烟粉尘在短短一星期内就夺走了 60 多人的生命。而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又相继在全球各地发生了诸如美国 1943 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 年多诺拉事件、1952 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以及日本 60 年代水俣事件、神东川的骨痛病事件、四日市事件和米糠油事件等。这一系列的环境公害事件在损害人的生命健康的同时，也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表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如切尔诺贝利事件导致核电厂方圆 30 公里范围的广大地区时至今日仍被划为无人区。

面对这些因人类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环境危机，西方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2 页。

② [法]克莱德·阿莱格尔：《城市生态，乡村生态》，陆亚东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9 页。

以待毙,他们积极展开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反思,于是才有了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社会掀起的风起云涌的环境保护运动。

在这些环保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无疑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在1962年出版的震惊美国社会的《寂静的春天》。在该书中,卡逊通过对当时北美地区因农业种植而大量使用的DDT杀虫剂(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的实证调查,发现了其对土壤和大气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该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讨论(如环保人士和农药生产商利益集团),并引发了美国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政策的制定。卡逊女士也因其先进的环保理念和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成为了美国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其“以自己的笔触唤起民众对生态问题的高度注意”^①。

在本书中,莱切尔·卡逊不仅揭露了人类因滥用化学农药而对自然平衡所造成的破坏,而且还对人类因科技的发展所拥有的破坏性力量进行了反思。她认为,人类因自身力量的增强而妄想控制自然的做法“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求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运用昆虫学的这些概念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武器武装起来,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经转过来威胁到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正是我们巨大的不幸”^②。而人类试图控制自然的做法在作者莱切尔·卡逊看来则是源于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在书的最后,她警告我们,人类的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交叉路口,我们既可以沿着资本家以追求利润而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经济效益的道路,从而在灾难的终点戛然而止;也可以走另一天通过环保的努力改变生产方式,抓住“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护我们的地球”的道路。

如果说莱切尔·卡逊以个人对抗农药生产商利益集团的行动仅仅是环保理念的萌芽的话,那么罗马俱乐部的创立则标志着跨国、跨地区的全球范围内的环保行动的开端。在成立之初,罗马俱乐部就秉承了创始人奥雷里奥·贝切伊的国际化、非政府化、去意识形态化、不为任何国家和政党利益服务的宗旨,

① 李培超:《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西方环境思潮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② [美]莱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从而以客观中立的态度为全球的环保行动提供咨询服务。截至目前,罗马俱乐部共有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近 100 余名代表,他们对当前全球关于人口、能源、粮食、环保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跨学科的调查研究,为国际社会开展跨国的环保行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其于 1972 年发布的科学报告《增长的极限》就是一典例。

在该报告中,来自麻省理工大学的四位科学家以翔实数据分析方式向我们展现出了人类在地球上无限制的增长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人类已经超出了地球环境的承载能力,但人类有足够的时间,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反思,作出选择,并采取行动进行矫正。”^①报告认为,与过去人类社会进行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一样,当今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可持续发展的革命”。这种在人类史上发生的第三次变革,针对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下的发展模式的改进,它有以下特点:

(1)这是一场在消费社会中使人保持物质生活“适度”消费的革命。

(2)这是一场以可持续、有效率、充裕,平等、美好和共有作为全社会最高价值观的革命。

(3)这场革命视经济为环境福利服务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旨在建立一个可持续循环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以便让人类社会与地球生态系统的循环融为一体。

该报告倡导一种“够了就行”的生活模式,以便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生活方式相对抗。因此,在出版之初就受到了多方面的抵制,但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逐渐加强以及该报告所预言的未来前景不断被证实,此报告已成为人类建设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所依赖的重要参考依据。截至目前,该书已更新至第 3 版(2004 年版)。30 年来,科学家们通过不断地更新数据与实验结果,为我们证明了地球的极限是真实存在的,人们只有改变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才能将人类社会“持续地演进到一个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更加美好的世界”。

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环保人士对环境公害事件产生的原因已达成共识——生态危机与环境污染是伴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自

① [美]德内拉·梅多斯:《增长的极限》,李涛、王智勇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 页。

然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而产生的。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认为,环境公害事件只是科学发展不成熟或应用不恰当的表现,并主张发展更加成熟与进步的科技手段用来彻底治理这些污染问题。与这些唯科学主义拥簇者相比,早在 100 多年前,马克思就看出了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采与利用不仅是一个科技发展的问題,更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科学技术只是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只有通过不同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分析,才能找到环境公害问题的真正原因。“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①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只有放置到社会生产模式中,才能得到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近现代的文明社会的进步得益于资本主义社会对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②但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也使现代人陷入了一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中而不能自拔。

在马克思·韦伯看来,“近代欧洲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只有在合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经过推理证明的数理逻辑和通过理性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相应地产生出合理性的法律、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合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是一切行动以工具理性为取向”^③。所谓的“工具理性”是指能够以计算和预估后果为条件来实现人的主观目的的能力,其看重的是手段达成目的的可能性。这样的一种能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异化”,违背了韦伯所言的“资本主义精神”,变成了资本家通过精密的理性计算而把社会(包括自然)的一切价值全盘利润化而为自身营利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理性将主体与客体分开,视客体为一种只有商品价值的被主体所用(或待用)的产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工具理性使人们对待自然事物不再像农业文明时期那样抱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1 ~ 12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5 ~ 256 页。

③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1 页。

一种神秘感与敬畏感,而是仅仅把它们当作一种商品的原材料予以看待,这即是“对世界的祛魅”。这种做法导致自然被看作是僵死的东西,其不再具有自身的价值的实体,而仅仅被视为归属于不同国家、集团或个人的财产而已。从泛灵论自然观到机械论自然观的转变,使人们不再珍惜与感恩来自于自然的馈赠,而把这些自然资源理所应当地看作是自己的劳动所得。而随着资本主义向消费社会的转变,“商品的积累导致了交换价值的胜利,工具理性计算在生活之各个方面都成为可能,所有本质差异、文化传统与质的问题,都转化为量的问题”^①。而通过礼物、供祭、消费竞赛、炫耀型消费而显现自身存在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更加加强了对“无生命化”的自然开采与掠夺。

生态美学的诞生则是对以工具理性为基础所建立的机械论自然观的反思,其认为忽视自然环境的自身价值而仅仅考量其的经济价值才是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而生态美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审美的方式唤醒被人们遗忘了的关于大自然的价值属性,从而在主体情感的层面改变人与自然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2. 生态美学诞生的学科背景

具有现代学科形态意义上的“美学”是在20世纪初经由王国维、朱光潜、范寿康、张竞生、蔡仪等学者由西方引入中国的。^②因此,在学科建立伊始就决定了我国美学学科以吸取西方理论为主的话语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在完成三大改造之后,经济基础已和以往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同,所以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需要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的模式,重新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意识形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美学因其特有的人文内涵与远离政治话语的属性而为学界乃至社会所广泛关注。“美学家们也满怀新的理想与信念,试图创造一种与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发展的时代特点相应的美学理论体系,美学大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应运而生。”^③其后,在经历了80

① [英]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② 在这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无“学科”这一概念,美学思想资源只是零散的见诸各种诗论、画论、文论以及哲学论述中。

③ 谭好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学术意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年代美学的第二次热潮后,经过李泽厚、朱光潜、刘纲纪、蔡仪、高尔泰等学者的讨论与建构,最终在吸收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等相关论述后,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为核心范畴的“实践美学”的美学学科形态。

实践美学萌芽于“美学大讨论”时期。当时因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美学学科的建设者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武装自己,并继而形成了蔡仪、李泽厚、朱光潜和吕莹(还有后来的高尔泰)等学者围绕“美的本质”的唯物/唯心属性而展开的激烈论战。在这其中,李泽厚因率先引入《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关于“自然的人化”对美的本质问题的分析并坚持“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的观点,从而在这场讨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支持者最多的一派。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断后,第二次“美学热”的论争各方在吸收了人道主义的合理因素后,纷纷转向了对青年马克思的手稿研究,期冀从这些人道主义的论述片段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李泽厚在充实“自然的人化说”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积淀说”,从而弥补了其理论关于美是如何从人类劳动转变为个体精神的审美感受过程的短板。朱光潜也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引入其理论,并认为艺术创作与劳动同属于实践范围,从而为自己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说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此外,刘纲纪、蒋孔阳等学者也纷纷从“实践”概念出发,提出了自己对“美的本质”的理解。总体而言,实践美学以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为学理依托,以类本质的人的实践活动作为美的本质的逻辑起点,认为美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具有自由创造的性质等。“综合半个世纪以来实践美学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美学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到实践美学始终将实践作为美学的基本范畴和逻辑起点,强调审美的社会性和物质性。”^①虽然各学派对“实践”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有所差异,但“实践”已成为诸多学者摆脱西方理论话语模式、构建中国特色美学理论的突破口之所在,而实践美学也成了当代中国最具生命力和理论内涵的美学流派。对随后涌现的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审美文化学、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生态美学等新的研究热点进行追根溯源,都离不开与实践美学的对话互动。

首先,从实践美学与中国美学学科的整体关系来看,实践美学过于强调美

① 朱志荣:《论实践美学发展的必然性》,《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的社会属性并将审美的发生(源于实践劳动)等同于美的本质的做法,忽视了审美活动的精神品质与个人感受,这就为随后的美学理论提供了从认识论到存在论、从美的本质研究到美的现象研究的话语空间,于是才有了20世纪90年代异军突起的后实践美学(以杨春时的超越美学和潘知常的生命美学为代表)对其的反思与批判。在后实践美学的冲击下,实践美学阵营内部也逐渐发生了分化并继而产生了新实践美学。无论是后实践美学对人的主体性和精神性的弘扬,还是李泽厚后期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依托的“情本体”的提出,或是以朱立元、张玉能、邓晓芒、易中天等为代表的主张从存在论角度对实践美学的补充与完善,从个体的、活生生的人的独特审美体验出发,而非从美的人类社会起源着手,思考审美活动的本质与现象已成为这些学者们所达成的共识。

“生态美学在中国的提出也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美学转向有关。”^①一方面,生态美学是对实践美学体系的扩充与发展。实践美学的代表李泽厚在《美学四讲》中认为:“哲学、美学不应也不会定于一尊,从而,可以也应该有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层次、途径、方法出发和行进的美学,有各种不同的美学。这不仅是理论的不同,而且还是类型、形态的不同。”^②在李泽厚看来,美学可分为哲学美学、理论美学、应用美学组合而成的开放家族,对美的研究不必拘泥于对美的本质的定义上。而生态美学的产生发展正是沿着李泽厚开拓应用美学的思路,对实践美学体系的一种“继续说”。但实践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并不是如李泽厚所说的那样是美的本质的哲学探究与具体的审美经验活动分析的从属关系。同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审美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美学研究热点的兴起一样,生态美学也是在越过实践美学的理论高峰后,经由与实践美学的对话而开辟出来的一个全新美学研究领域。另一方面,生态美学所坚持的存在论治学主张也对实践美学的认识论倾向作出了理论上的纠正。实践美学把“美”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并试图在人类劳动中寻找审美发生的本体论做法,实则违背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言的应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去理解事物”的本意。“实践论美学力主美的本质的客观论。这是一种传统的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本质主义的命题,属于科学认识的范围,而不属于

① 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② 李泽厚:《美学四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